

中國共產黨歷史參考資料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中共黨史教研室 編
社會科學資料室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PDG

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党史教研室 編
社会科学資料室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1957年4月

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三)

中共党史教研室 編
社会科学資料室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出版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1957年4月

目 錄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党黨員書（1927年8月7日）·····	（1）
中國現狀与共產党的任务決議案（1927年11月中國共產党 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33）
中國共產党第六次大会政治議決案（1928年7月9日）·····	（50）
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	（77）
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	（80）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議決案（1929年6月）·····	（82）
由于工農紅軍冲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机逐漸成熟而 產生的党的緊急任务（中央議案1931年9月20日）·····	（107）
为抗日救國告全体同胞書（“八一”宣言，1935年8月1 日）·····	（118）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議決（瓦窑堡會 議，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過）·····	（124）
清算党內的孟什維主义思想（1943年7月）····· 刘少奇	（144）
学习毛澤东同志的“實踐論”（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報 社論）·····	（155）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党黨員書

中國共產党全体黨員鑒：

(一) 緒 言

同志們！

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現在致書于全体同志的時候，正是很困難危險的時期——偉大的中國革命遇到了極艰巨的磨折。今年4月間蔣介石在上海發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漢政府領域之內繼續發展而完成，三個月以前，武漢政府曾經宣佈，蔣介石是革命叛徒，現在呢？他自己學了蔣介石的榜樣反革命，如今冒國民黨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國民黨之名，來摧殘工農運動，在武漢領域之內與蔣介石之治下是一樣的；他們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農民協會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農運動的指導同志被武漢政府的將領所殘殺，農民運動所及的區域，無不受反革命的清鄉所蹂躪；工人亦是到處受摧殘，他們的武裝被解除，他們的工會日益受着壓迫或占領，他們的指導者亦被殘殺，工會機關之中到處遇見軍閥豪紳指派來的走狗。壓迫得尤其嚴重的，便是我們的黨。一切反革命勢力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從反动軍閥一直到被革命所嚇慌的小資產階級。然而現在他們不稱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及蔣介石所領導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為人民之公敵，却稱共產黨為人民之公敵。國民黨現在的領袖汪精衛等，卑劣無恥的叛背了國民黨的主義及傳統，接受軍閥的命令而與共產黨破裂。國民黨驅逐軍隊中的共產黨黨員，我們的黨不得不秘密起來；因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滅我們。反革命暫時的得着了勝利，正拿着武裝來對付勞動階級。如果現在所有的工會

還沒有搗毀淨盡，如果工農運動的指導者還沒有完全被殺，如果政府還在宣言保全工農團體，那末，這不過是因為反革命的軍閥和國民黨的領袖還沒有完全集中團聚自己的力量。

我們要知道，如果群眾運動不能夠起來堅決的反抗，最近期間白色恐怖決不會減弱，只有越發厲害。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尊重”工農，沒有絲毫的幻想！這所謂國民政府是什麼？他從革命的政權機關變成了資產階級之反動的執行機關，變成了軍閥的工具。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如汪精衛之類，見着革命發展便嚇慌了，寧可背叛國民黨的主義，完全走進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對於資產階級的反動派，現時還有些用處；因為革命運動的力量沒有完全鎮壓下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利用國民黨的這些叛徒，好暫時冒着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招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大多數其實已經背叛了，出賣了革命的國民黨之光榮的旗幟。

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汪精衛孫科等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既已走到反動方面去，自然不是國民黨的代表和領袖；所以一切工人農民都應當知道，最近期間的白色恐怖，要在汪精衛叛徒的旗幟之下能實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只有廣大的勞動群眾積極起來反抗，實行革命的鬥爭，才能奪去篡竊國民黨旗幟以實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撲滅反革命。

現在的形勢是反革命派屠殺工農群眾，壓迫群眾運動，搗亂工農團體，所以中央委員會首先要告訴你們的，便是你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黨從群眾運動里發展成了偉大的力量，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他的作用是絕對的偉大的，現在我們黨的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問題的歷次決議，都說黨的政策及黨的指導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過去中國革命的進程，大半與本黨政

策有关系的。將來革命的命運在形勢變更之後，更加要靠我們黨的政策正確，要看我們黨對於形勢變更之後的職務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決議指出我們黨的指揮做了極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全党積極的自己批評這些錯誤而糾正他們。這些錯誤並不是指各個的偶然的錯誤而說的，而是說黨的指導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拋棄這一機會主義的方針，糾正過去的錯誤，那就不能正確的規定將來的工作，自然更不能進行革命的鬥爭，以適應當前的艱巨職任。要糾正錯誤的方針，必須指明是怎樣錯誤的，應當要使每個黨員都得着過去的教訓；我們黨如果不糾正指導機關的錯誤，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進。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党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怕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深信本黨的生命與力量決不致於怕披露和批評我們的疏忽和缺點，甚至於披露之於我們階級仇敵之前也無所怕。等共產黨的敵人幸災樂禍好了！讓他們去亂叫共產黨崩壞好了！這種攻擊，是嚇不了我們的，我們勝過敵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里學習出來，絕無畏懼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我們黨有這種偉大的力量，不但因為我們黨的階級性使然，而且因為有群眾的奮鬥，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群眾之奮鬥做保證——這些群眾是我們黨的基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上說：“中國共產黨英勇的奮鬥，中國共產黨廣大的黨員群眾，艱苦犧牲的在

社会下層工農城市貧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奋斗。”我們党的指導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錯誤，經常的动摇和犹豫，在緊急关头总是沒有坚决行动的決心，指導机关的非共產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論，以及不革命的行为，不但絕對的与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相矛盾，並且和我們黨員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說：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黨員群众都有过偉大的奋斗，屢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3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歷史，不但在中國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頁光荣的歷史，是上海共產党——无產階級所寫的。

上海无產階級在共產党指導之下所表現出來的勇敢性，革命性，階級意識的坚决和政治意識的高度，甚至歐洲各國无產階級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國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歷史呢。中國共產党可以以上海的共產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蔣介石屠殺之后，虽然受着聞所未聞的压迫，許多最好的指導者（如陈延年，趙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殺，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繼續着斗争，表現不可摧殘的偉大力量。广东的共產黨員，領導了鐵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領導農民运动的武裝暴动能够在各地方繼續抗爭至兩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產黨員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階級的先鋒的榜樣。湖南同志領導農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國歷史里的一頁，農民协会的实际的政权，是共產黨員領導，而農民群众所創造的；自动沒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于鄉村農民，解除豪紳团防的武裝，創立武裝的農民軍，嚴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極偉大的農民运动的規模，而且会和國民黨下層群众結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組織

農民暴動，以反抗長沙的反動政權（這次暴動如果不是中央黨部機關在緊急關頭採取可恥的退讓政策，無疑的是勝利的。）——這都是湖南共產黨員努力的成績。這是解決土地問題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產黨員群眾，亦是如此。黨員群眾的行動真正是英勇徹底的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要忍受很大的犧牲，但是我們黨的群眾沒有怕犧牲的。中國革命之中，他們的奮鬥，使得我們的黨取得偉大的光榮和信用。黨的群眾是我們力量之源泉，有他們的幫助，黨的指導機關之錯誤，無論如何大，都是容易糾正的。固然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沒有堅決實行的能力，這對於中國民眾的革命鬥爭，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大有損失；然而本黨有上海廣東湖南的經驗，決不會因指導機關之錯誤而陷於敗亡。本黨一定有這個力量，保證今後有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指導。

（二）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於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了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里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正確些說：是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黨的指導每當解決這些革命之根本問題的時候，時常在理論上實踐上違背共產國際的根本原則及列寧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估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陷於最庸俗的機會主義。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而有生長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趨勢。中國革命尚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他反對帝國主義之壓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會經濟政治的遺毒。現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階級要求解除聞所未聞的壓迫制度，與奴隸制度之爭鬥；這種奴隸制度，正是帝國主義依據中國封建關係以建立其統治之基礎。

如果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相對立，那末，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簡直不是布爾塞維克的。共產國際向來反對這一般的觀點，認為是最壞的一種機會主義。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反對以國民革命的職任與階級鬥爭的職任相對立的觀點，這一類的觀點在西歐各國的極左派與社會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實這是拋棄中國民權革命中無產階級之領導權，拋棄領導權而爭所謂‘勞工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是機會主義之一種，實際上便使無產階級變成‘民主營壘’的尾巴。”中國革命中各種社會階級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遺毒，是外國資本無限制剝削中國民眾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維持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所以非常之明顯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封建制度的破壞，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而要破壞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愈堅決愈劇烈，農民群眾加入鬥爭的愈多，殲滅地主豪紳的統治愈厲害——則國民運動的規模愈廣大，國民運動的勝利愈鞏固。

從另一方面觀察，外國資本在經濟上勾結一部分城市資產階級（買辦），這一部分資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保存而擴大。

至於所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呢？那末，他們是受外國資本的競爭而又受其排擠的一部分中國資本。因此，他們被逼而不得不對於帝國主義實行經濟鬥爭。

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曾經參加中國的革命，甚

至有一时期曾經做这一运动的領袖，然而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及農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階級的要求，中國共產党的影响又大大的發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資產階級离开國民革命的战綫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壘。民族資產階級这种政策上的变節，以蔣介石在上海的屠殺而著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今年4月間飽受革命运动偉大的規模之恐嚇，就要去和帝國主义妥協，他如今和買办階級封建階級的大地主相象，將要成为外國資本对于中國統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產階級的斗争——力爭自己真正的階級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須的条件。

中國无產階級的階級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國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國无產階級的階級斗争，足以掘断帝國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聞所未聞，这种情形，保證了外國資本在中國取得了最高的利潤。反对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國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國工人階級則因客觀狀況的关系，是力爭中國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徹底最不妥協的階級，此种情形，使中國无產階級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領導权。可是中國无產階級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國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爭自己的階級要求的斗争的發展，就是反对外國資本及中國資產階級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產國際执行委員會第八次全体會議決議案說：“共產國際执行委員會承認中國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國主义的革命）已經‘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殺之后，已經开始了別一种工農的階級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國革命現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階級力量离合現勢，表明並且証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內），尤其是反帝國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須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斗争之中；徹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

不会和工農群众的斗争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發展广大的下層民众的群众运动。

誰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誰要中國完全脫离外國的压迫，他便应当促進，擴大並激勵工人反对資產階級，農民反对地主的階級斗争，他便应当贊助社会斗争，使之進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資產階級，則除去少数的反动的成分，与買办階級封建階級相勾結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業者，商人，学生，店員及城市貧民，亦因自己客觀狀況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階級运动之胜利。然而小資產階級必然是动摇，猶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階級及革命反革命之間。这种猶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輕重的力量。

但是小資產階級动摇猶豫的态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階級运动的力量决定的。工人階級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劇烈，農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則小資產階級愈能轉向左傾，愈能站到革命的战綫上來；反之，如革命的階級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現动摇，不徹底，不堅定，則小資產階級愈加傾向資產階級的营壘，反革命的营壘。无產階級的先鋒隊，除自己的堅定与果決外，沒有更真实的領導小資產階級的方法。

列宁屢次的說過：“誰要幫助动摇猶豫的人，必先自己开始便应当不动摇不猶豫。”我們是应当記着，社会之中既然發生了兩大階級——資產階級与无產階級的斗争，小資產階級便無論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資產階級同道，或者和无產階級同道，无產階級应当明了小資產階級之动摇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問題。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國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決定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們党的指導，在理論上，尤其是在实际上，

剛剛對於中國革命中各階級的力量的估量，有一個相反的观点。這就預定黨的指導之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維克派似的，將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對立，仿佛認為階級鬥爭的開展，足以破壞國民革命，而要想叫全黨及工人階級農民都自己來限制階級的要求，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不用革命的鬥爭方法。中央在6月19日所發給上海的信，對於上海鬥爭的指令說：“中國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國主義……現在幾乎忽略反帝工作”，仿佛專注意於進攻封建制度，而得到不好的結果。中央罵共產黨員走得太遠了，更叫本黨所領導的革命的農民往後退，這一指令里又說：

“一方面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沉下去，別方面工農運動發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資產階級看來是如此。單調的去武裝工農沒收土地，高叫非資本主義前途等口號，使小資產階級懷疑共產黨快要革國民黨的命，要進行階級革命而不是國民革命。”這樣中央那時認為階級鬥爭是一事，國民革命又是一事，這一信里又說：“小資產階級看不見沒收土地是國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為只有共產黨要沒收土地實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農的力量，因此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提出這種問題，不能不要求限制工農運動，甚至於與共產黨破裂。在這種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呢？如果這樣，那就是取消我們的力量，拋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投降蔣介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沒收土地武裝工農呢？這個結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滅革命的根據地。如果我們不能用相當的方法過渡這種難關，那就是資產階級勝利。我們應不應當拋棄沒收土地武裝工農的政策呢？這當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許的問題，我們已經決定領導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武裝起來，這是獨立的政策。但這種政策太危險了，假使我們完全獨立的干起來，那末，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將要破裂。固然這是光榮的失敗，但是破裂對於我們是不利

的，我們应当找新的道路。經過新的道路來渡過現在所遇的危機與困難，使革命深入廣出，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指令的結論是：中央叫上海的黨部“不要看着國民革命運動是工人問題”，而要到了各階級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說去宣傳上海資產階級。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不革命的非共產主義的方針，足見中央指導機關對於革命的根本問題，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質問題的見解都是錯誤的。

中央在這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是共產主義者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反映，整個的革命的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這種方針，完全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決議不符，完全與黨員群眾工人階級及革命的農民之鬥爭不符。

誰要替這個機會主義者辯論，或者主張繼續這種機會主義，他便永久和共產主義告別了。

（三）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就是無產階級最先進，最革命，階級覺悟最高的一部分。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永久從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出發，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既然以工人階級利益為最重要的前提，同時，再要提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中客觀上可以解決的要求，在這一革命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的時期中，都是如此。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群眾而指導他們的鬥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及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隸狀況。

這種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主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群眾的獨立鬥爭。共產黨應當發展擴大並激勵無產階級的階級鬥

爭，应当領導工人每次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共產國際屢次命令中國共產黨，要我們盡量增進工人階級群眾的物質生活，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工人的社會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壓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認識自己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利；同時共產國際指示必須迅速勇敢堅決的實行武裝工人和農民，尤其是其中最覺悟最有組織的分子。這一政策國際是認為萬分必要的，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和各地工業區工人群眾自己鬥爭是相符的，和本黨黨員群眾的行動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黨指導機關却是走的別條路，他只在阻止緩和階級鬥爭和工人的革命行動，中央不去開展推動罷工運動，却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主權屬於政府。在各階級聯盟的政府之下，其先一時期，這一政府而且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這在客觀上是有種種的利益，實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實在大大的阻礙工人運動；那時國民黨中央有不得政府同意，不能有企業中之罷工之決議，又有要工會不為工人要求而鬥爭，須要守勞動紀律的決議，我們中央並沒有反對。中央政府以為限制些工人運動，可以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盟，沒有懂得我們不堅決的擁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只有使資產階級更加右傾。中央想盡方法限制工人的經濟鬥爭，不使他們為自己階級直接的利益而鬥爭，其實這種要求不能實現，便永世也說不到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央當時規定這種策略，實是因為對於小資產階級聯盟的觀察是錯誤的。對於國民革命之利益的觀念也是錯誤的。

自然爆發而發展的工人運動，自下而上建立了強大的工會，完全在共產黨員影響之下，並且發生了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及廣大的勞動童子團等等。工人階級自己覺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來反抗資
本家，而資本家早已反革命，對於生產則怠工，故意造成工業的危

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資產階級便大叫其“过火”，如是不僅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認，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說“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說給工人听，說不应占領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閉厂，也不应当，說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說决不該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顯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該。

潮流似的工人階級向着真正工農民权独裁進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沒有設法武裝工人，他反一遇見資產階級方面的不滿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裝，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为保存与小資產階級联盟起見，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國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嚴守革命紀律，还要工会去执行，違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們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話也沒有提出抗議，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認。中央对于工人階級表現的独立性，每次都說是“过火”或“幼稚”，沒有注意自己所說的話，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的話。

党的指導机关的錯誤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經濟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也是如此；武漢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歷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經過党的指導机关而实行的，並且中央在事后还說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的秘密工会，而使他們加入蔣介石的黃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懼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問題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導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經過共產國際执行委員會坚决的要求之后，方才將几个工人加入指導机关。許多工会之中指導者的黨員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識分子。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分子减少些，說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

識不發達，不覺悟；然而事實上，譬如上海的工人，其政治意識比黨的指導機關高的多；我們黨和這種非無產階級的，不革命的，透徹的機會主義，必須斷絕關係，永不沾染。

（四）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中心問題，共產國際特別說明這一問題不止一次了，這許多時候，共產國際曾經給我們中國黨明顯清楚的指示，指示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亦就是繼續以前的指示。這一決議說：“要引群眾來鬥爭，只有在農村中依據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據工人階級需要之滿足及其政治權利的保障；堅決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沒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貧農所欠重利盤剝者的債務，禁止苛稅，堅決的要求減稅；而使富人多負稅捐的責任，這些要求應當實行之於全國，首先是武漢政府領域之內。這些要求應當可以引起群眾反對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並反抗北方軍閥。”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之內容，現時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幾千百萬農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則應當做這一運動的領袖，而領導這一運動，並且共產黨應當在政府中實行一種政策，使政府自己贊助土地革命之發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將現時的政府，變成工農運動的組織上政治上的中心，變成工農獨裁的機關。

然而黨的指導機關的工作，恰好和這種革命方針絕對相反，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極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反對豪紳地主，然而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違背他的指示指令而做出來的。總之，只有自下而上的運